革命玫瑰

——国家非遗桑植民歌见证的『血色浪漫』

□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阮周围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得来，你自个人移花别处栽。”1928年夏的某一天，红军师长贺锦斋用这首桑植民歌与爱妻戴桂香生离死别。

一个多月后，贺锦斋在石门泥沙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两年不来我两年捱，钥匙不到锁不开。”1931年夏天，惊悉噩耗的戴桂香悲恸万分。

她终生素衣守寡，60多年里几乎每天都去丈夫坟前唱这首歌，每天摘一两片马桑叶，直到离世，她留下的一口木箱，装的全是马桑叶。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如贺锦斋和戴桂香般的“血色浪漫”故事，像当地常见的灌木——马桑树般漫山遍野。

先烈的精神，像马桑树一样，风吹不断，雪压不弯，火烧死了枝叶，根依然顽强活着，春风一吹，又吐新芽！

隆冬时节，记者走进昔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核心地带——湖南省张家界市。此地当年是战场，如今已是世界自然遗产和知名风景名胜区。

在永定区大溶溪光荣院颐养天年的侯宗元，7岁多就和父母、叔伯、兄嫂等7人一起投身红军。

“一个炸弹在身边爆炸，冲击波把我一下子掀到了河里，幸亏揪住马尾巴才没淹死。”侯老说，“我父亲被子弹击中腹部，没几天就伤重去世。我一家八口，大部分都战死了。”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六军团及在此基础上组建的红二方面军，牵制了国民党军50多万兵力，为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一尊雕像中的三位红军都是独臂。副馆长覃章衡告诉记者，红二方面军出了三位“独臂开国将军”——贺炳炎、余秋里、晏福生。

讲解员谷秀芹含泪介绍，1935年12月21日，时年22岁的红军师长贺炳炎在激战中右臂中弹负伤，伤势恶化必须截肢。没有麻药，贺炳炎让医生用木工锯锯断伤臂。

“木锯‘吱嘎、吱嘎’锯了两个多小时，贺炳炎疼得把嘴里的毛巾咬出几个大洞。闻讯赶来的贺龙从地上拾起几块浸透鲜血的碎骨，对周边红军干部、战士说：看！这是贺炳炎的骨头，共产党人的骨头，有多硬啊！”

张家界市委宣传部部长郭天保告诉记者，1927年至1936年，张家界地区先后有20多万人参加革命，2万多人参加红军，6万多人为中国革命光荣牺牲，不少家庭满门英烈。

张家界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陈美林说，红军将士的壮举，在桑植民歌中催生了追求光明的战斗号角——“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架在颈项上，砍掉脑壳只有碗大个疤！”

行走在武陵山腹地，先烈故居、红军医院、战场遗迹、红色苏维埃旧址……无数壮怀激烈的往事，在马桑树丛中迸发着血与火，泪与笑。

红二军团老战士魏天禄回忆：部队时常断粮，靠采集野菜、挖掘树根充饥。偶尔分到一颗熟土豆，觉得特别香，特别珍贵，用手捧着吃，连一点沫子都舍不得丢掉。有人实在饿极了，还没嚼出味儿，土豆就下肚了。见别人慢慢吃，很是后悔。有时土豆少人多，就捣烂土豆加野菜煮糊糊，大家分着吃。

张家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许丹、讲解员杜双说，红军处处为群众着想。打土豪没收来的东西，悄悄送群众；帮群众种地、挑水、修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纪念馆至今还收藏着当年红军以高于市价支付给菜农的十块银元。

陈美林说，面对红色风暴与白色恐怖，人民做出了选择——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军、支援作战、筹物筹资……

桑植民歌就此唱道：“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顶搭高台……”“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鱼水深情共死生，红军将士在战场上更加视死如归。

红四军一师一团团长贺桂如在战场上高喊：“同志们，为了下一代能吃上大米饭，冲啊！”身先士卒冒着弹雨冲锋，身中7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1951年，贺龙给堂嫂陈桂英（贺桂如的母亲）的信中说：桂如侄儿的血没有白流，换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很光荣！

记者采访期间，无论走到密林深处、溪河岸边，还是走到城乡文体广场，坐进和谐号动车或高速公路奔驰的大巴上，到处听到桑植民歌红色山歌的歌唱，到处看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慈利县溪口镇樟树村“苏维埃溪口区政府”旧址所在地，田畴广植金秋梨、葡萄、西瓜、桃子；滨水的河滩，也办起了户外拓展体验旅游项目。

村民王家顺告诉记者，全村流转土地680余亩发展旅游和果蔬采摘等绿色经济，全村1300多名村民不同程度增收，贫困户都脱贫奔小康。

在贺锦斋墓地一侧，是马桑树环抱的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60岁的院长贺晓英很自豪地向记者展示了“返聘证书”。30多年来，贺晓英服务过戴桂香等100多位革命老人。“党的政策好，社会各界很关爱，光荣院的工作越来越好做。”

在洪家关光荣院身后，莽莽群山中绿色经济正在崛起，满山野生粽叶畅销海内外，助8万余人脱贫致富；“桑植白茶”香飘大江南北，产值达2.28亿元……去年桑植县遭受疫情影响和罕见强降雨冲击，但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9106户98575人全部脱贫。

桑植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佐绒说，桑植民歌孕育于先民与天灾、刀兵抗争的呐喊中，到如今唱响着新时代美好生活画卷。就像新歌《最美还是八大公山》所唱：吊脚楼里住神仙，筒车打水也浇田；花灯翩翩追彩梦，仗鼓声声响在山里面；祖宗留下的歌和舞，灿烂辉煌到今天……

（新华社长沙2月3日电）

越生态越吃香 越土特越值钱

——彭水大垭乡依托自然山水林地发展特色养殖业

脱贫攻坚答卷⑯

□本报记者 陈维灯

2月1日，彭水大垭乡冬瓜村一组大河坝，王元生正在养殖基地查看冷水鱼长势。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嗷——嗷——嗷！”2月1日下午4时左右，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垭乡大垭村，海拔900多米的李虎台树林，突然传出一阵阵大象的叫声。

这里怎么会有大象？

叫声停下不一会儿，茂密的树林中有了动静：竟是一群全身棕黑色、个头不大的猪儿从林子里蹿出。它们像听到集合号一样，飞奔至一处坪坝上。

“这是我们养的野猪，销路好得很，一般长到百把斤就被预定了。大象叫声是它们的‘吃饭铃’。”坝子上，53岁的向尚权拿出南瓜、红薯和玉米配制的“晚饭”撒在地上，让猪儿们吃了个欢。

2016年，向尚权的儿子秦仕强发动18户村民（其中9户贫困户）拿出林地，加上村集体的林地，总计5000亩，入股成立了蜜林野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每年每户村民享受1.2%的利润分红。

大垭乡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产业扶贫难度不小。

“脱贫攻坚，关键在产业。”大垭乡党委书记赵中娅介绍，现在农副产品越生态越吃香，越土特越值钱。为此，当地以自然山水林地为依托，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理念，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业，探索出一条脱贫攻坚新路径。

漫山遍野跑野猪 跑出村民致富路

“老汉，帮我挑一头100斤左右的野猪，明天上午我过来拉。”正在给猪儿喂食的向尚权接到儿子秦仕强的电话，说大垭乡某餐馆要订购一头野猪。

“目前，土猪整只购买的话是每斤25元左右，我们这个是野猪和家猪杂交品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价格也要比土猪贵一倍。”向尚权介绍，100斤左右的野猪售价5000多元。2020年，合作社销售野猪200多头，18户村民户均分红近3000元。

那么，秦仕强为何要在李虎台养野猪，又为何要用大象叫声作为野猪的“吃饭铃”呢？

今年28岁的秦仕强是土生土长的大垭村人，多年来一直在外地一养殖场打工。5年前，他获悉养殖野猪市场前景较好，便决定回乡养野猪。

秦仕强从四川购进第一批野猪80头，“为了让野猪不失去野性，品种更纯、肉质更好，我想到了围山建场的生态养殖方式。”

他的想法得到了村委会和村民的支持，村集体和18户村民以林地入股共占20%的股份。

“养野猪既要保证其野性，也要让它们‘听招呼’，进食就是关键一步，选对‘吃饭铃’很重要。”秦仕强介绍，经过多次试验，他发现最适合当“吃饭铃”的是大象的叫声，“大象的声音从来没有在大垭村出现过，不会被相似的声音干扰。”

近年来，合作社的野猪养殖规模逐年扩大，村民的收益也越来越好。

大垭村六组贫困户代发书在2020年分红3000多元，但他选择等价从合作社换取了两头猪崽自己喂养，“养到200斤左右，合作社包回购，一头能卖1万多块钱。”

秦仕强介绍，除了自己喂养之外，合作社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周边村民特别是贫困户提供猪崽，待村民将猪崽养大后再以市场价回购，最大程度保障村民的利益。

下一步，秦仕强计划在控制养殖密度、保护环境的同时，扩大养殖规模和品种，延长产业链，带动更多的村民通过养野猪增收，“如果一切顺利，今年我们的养殖规模能达到1000头左右，村民户均分红将超过1万元。”

烂田湾里养土鸡 自强不息惠乡邻

2月1日下午5时左右，大垭乡木蜡村一组烂田湾，56岁的王天忠刚从库房里扛出一袋苞谷粒，300多只土鸡就从山林间蹿出，将他团团围住。

“多的时候有3000多只，那场面才壮观。”王天忠一边抛撒苞谷粒喂鸡，一边和重庆日报记者闲聊着，“腊月前就卖得差不多了。上门来买一只128元，快递的话一只148元。”

2020年，靠着在烂田湾养土鸡，他收入40余万元。

其实，王天忠以前也没大规模养过鸡，没做过生意，还是村里的贫困户。王天忠的妻子去世多年，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正在读书的孩子。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家人生活艰难。

“出门打工，年纪大了不好找活路，也照顾不到屋头，我就想着能不能搞个土鸡养殖场增加收入。”2018年，在乡政府的帮助下，王天忠贷款在当地收购了一批土鸡蛋，并用孵化机孵出了鸡苗，开始喂养土鸡。

如今，他不仅建起了土鸡养殖场，开起了重庆蜜蜡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还带动村民们一起增收致富。

2019年，王天忠以每只3元、比市场价低12元的价格向88户贫困户提供了1.3万余只鸡苗，并约定待村民喂大后以市场价回收，“当年回收了6000多只，花了70多万元。”

木蜡村二组贫困户冉前进就通过这种方式，当年收入2.7万多元。

王天忠还帮助村民代养土鸡，贫困户冉崇义、冉明建就是其中两户。王天忠为他们各代养300只土鸡，按照销售利润的20%给两户村民分红。

虽然自己喂养的土鸡供不应求，但王天忠在接到订单时，总是优先考虑帮助其他村民特别是贫困户销售土鸡，“我现在生活好了，那是大家帮忙，人要晓得感恩。”

如今，在王天忠带领下，木蜡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喂有土鸡，也不愁销路。

大垭乡龙龟村本土人才李姗娜大学毕业后，回乡创办了彭水县那山那味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利用电商平台帮助全乡村民买农产品。2020年，由她对外销售的木蜡村土鸡就超过3000只。

大河坝上建鱼池 泉水养出生态鱼

当日，记者从大垭乡场镇出发，沿着蜿蜒的村道驱车前行，十几分钟后，就来到大垭乡冬瓜村一组大河坝。两座青山之间，冬瓜溪奔涌而出，溪水清澈，在山间冲刷出一块坪坝。

利用这条发源于崖壁溶洞的冬瓜溪，山间闲置多年的30几亩田地建成了28个鱼池。14户村民（其中贫困户7户）摇身一变成了股东，每年坐享分红。

“冬瓜溪水量充盈，枯水期也不见减少，而且水质好、水温恒定，很适合冷水鱼生态养殖。”2017年，在外经商多年的冬瓜村村民王元生和张玉琼夫妇回到家乡，决定在大河坝发展鲟鱼等生态鱼养殖，并成立了彭水县聚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贫困户向国其以9.5亩土地折价3.8万元入股，贫困户刘强以6亩土地折价2.4万元入股……“一些村民以每亩土地折价4000元入股，一些村民以现金入股，年底享受5%的分红。”王元生说。

修建养殖基地，到成都、贵州、云南学习养殖技术、管理经验。为了更好地管理养殖基地，夫妻俩干脆就把家就安在了鱼池旁边，“这里离不得人，洗鱼池、分鱼、调控水流、喂饲料……哪样都要格外细心。”

2019年，养殖基地销售收入40余万元，参股的村民户均分红超过2000元。即使在2020年冬瓜溪因暴雨突发山洪，损失20余万元，王元生还是按照约定给村民分红。

王元生介绍，目前，养殖基地里喂养有鲟鱼、草鱼、鲫鱼等鱼类7万多尾，主要销往重庆主城、贵州、云南等地，“下一步，我们计划将生态鱼养殖与乡村旅游结合，为游人提供垂钓、喂养、吃鱼等全产业链服务，把基地做强做大，让村民获得更多收益。”

绿水青山养中蜂 酿出生活比蜜甜

近年来，大垭乡还利用当地森林茂盛、蜜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引导农户发展中蜂养殖，全乡中蜂保有量达到4200群。

大垭乡龙龟村村集体成立了彭水县长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了中蜂500多群，2019年产蜂蜜500多斤。

“村集体养殖的中蜂，全村村民都能参与分红。”龙龟村党支部书记向永强介绍，按一斤蜂蜜120元计算，一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有6万多元。

52岁的贫困户李生云是个单身汉，村里聘请他为村里的中蜂养殖场管护员，每月工资1500元，每年还能享受中蜂养殖20%的利润分红。2020年，李生云全年收入超过两万元。

除了村集体规模化养殖中蜂外，龙龟村的许多村民也自行养殖中蜂。2020年，李姗娜的合作社累计帮助村民销售蜂蜜1500多斤，仅龙龟村就卖了400多斤。

55岁的贫困户冉龙珍养殖中蜂5群，2020年产蜂蜜30多斤，销售收入4000余元。

“我们的蜂蜜，大部分都是姗娜帮我们卖出去，一斤能卖130块钱。”冉龙珍告诉记者，李姗娜以每年2400元的租金租用了自己一楼的门面作为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同时每年还给自己分红1000元，“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一年收入也有3万块。”

重庆“拐棍队长”：

拄一根拐棍走过近6年扶贫路

□新华社记者 韩振 陈青冰 周文冲

尽管村民们都脱了贫，但“拐棍队长”刘红依然在田间地头忙碌。他跟群众一起对产业大棚进行修复，以准备接下来的育苗、播种。

腿脚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每天吃八九种药……在重庆巫山县，刘红拄着拐棍，在扶贫岗位上一干就是近6年。

2015年7月，刘红被派往庙宇镇杨柳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长。那时，村内优亲厚友时有发生，干群关系十分疏远。刘红深知任务艰巨：前期扶贫工作最困难，头开不好，后面的政策就没法实施。

他选择用“土办法”，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宣讲政策、了解情况、解决困难。仅一年时间，刘红就走遍了全村109户贫困户，平均每户走访3次以上，重点户走访超过10次。

杨柳村山多地陡，刘红因为走访农户，膝盖磨损严重。久而久之，刘红行走过程中，便多了一根拐棍。只要听到“嘟、嘟、嘟”的声音，村民们就知道刘红来了，还送给他一个外号——“拐棍队长”。

78岁的吴扬前曾是村里的深度贫困户，和妻子住在一座破烂不堪的土墙屋。刘红发现后，马上上门给吴扬前介绍危房改造政策。但是吴扬前不为所动，他说自己不想搬，也没钱搬。实际上，他是不相信有这样的好政策。

了解到吴扬前的顾虑后，刘红没事儿便去他家里唠家常，最终赢得了吴扬前的信任。后来，吴扬前和妻子两人各获得1.3万元的房屋补助，再加上妻子1.5万元的残疾人补助金，老两口没花一分钱，便住上了新房子。

搬家那天，刘红代表政府送上彩电、大米和菜油当贺礼。吴扬前的泪水含在眼里，一直说谢谢。

刘红的拐棍换了一根又一根，杨柳村的基础设施也从无到有。2016年底，杨柳村已完成了8.5公里产业路、10口人畜饮水池、1000亩脆李等项目建设，全村45户贫困户成功脱贫。

2017年，刘红在杨柳村的扶贫工作结束。早上8点，他离开时，一些村民早早站在村口，准备与他告别。有些村民行动不便，走到村口要花一两个小时。

村里老人黄成秀，双眼视力不好，紧握着刘红的手说：“刘队长，你可不可以不走？我的眼睛现在看你都看不清楚了，我怕我以后都看不到你了。”

刘红从杨柳村调到了笃坪乡，职责依然是扶贫。

当地村民曾试过种植党参。但党参生长周期长，还经常被野猪糟蹋，效果并不好。刘红多次深入考察后，建议笃坪乡向阳村种植牛膝：牛膝生长周期短，味道对野猪也没有吸引力，既能在短期内见收益，还可以保证种植质量。刘红又找药企合作，解决了牛膝销售问题。

如今，向阳村全村再也看不到荒地，村民生活越来越好。但刘红却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乡村振兴仍是块‘硬骨头’，现在乡村虽然基本实现一村一产，但农产品在商品化、品牌化、科技化等方面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刘红，始终没有放下他手中的“拐棍”。

（新华社重庆2月3日电）

党史上的今天·重庆

1941年2月4日

《新华日报》营业部遭国民党宪兵捣毁

1941年2月4日 国民党宪兵三团指使特务流氓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殴打逮捕报丁报童，反复三次将张贴在营业部门前的《新华日报》撕毁，并指使重庆派报工会贴出拒绝派送《新华日报》的宣言。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和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等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制止。至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才复函说：“已批复对《新华日报》予以保护”。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